



杜维明作品系列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大陆讲学、答疑和讨论

杜维明 著



杜维明作品系列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大陆讲学、答疑和讨论

杜维明 著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大陆讲学、答疑和讨论 / 杜维明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6

(杜维明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307-8

I. ① 儒… II. ① 杜… III. ① 儒家—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 B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0787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sdxjpc.com

印 刷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

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 数 204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42.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自序

1978年秋季，我参加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海洋学代表团到中国大陆进行了一个月的学术交流。在北京逗留的七天中，除访问北京大学，参观北京图书馆以及和马王堆古籍整理小组的成员论学外，也向三百多位史学工作者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识”为题，做了介绍韦伯分析方法的学术报告。十年来，我和大陆的学术界，特别是专攻中国哲学的理论界，一直保持经常的、广泛而深入的沟通。1980年我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习了九个月，亲领赵光贤、何兹全和白寿彝三位先生的教诲。刚恢复的北京哲学会曾邀我在一次座谈会中做报告，记录《哲学的整合与分化》刊于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筹备处所编的《社联动态》第42期（1980年6月20日），我的三篇论文《儒家仁学中的道学政》（《中国哲学》第5期）、《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中国哲学史研究》第2期）和《从“意”到“言”》（《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一辑），都是在北京撰写的。那年在大陆期间，我也曾到武汉、兰州、昆明和上海进行学术交流。1983年我参加了汤用彤先生冥诞百周年的纪念学术会（北京大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会议（西安），我的

论文《魏晋玄学中的体验思想——试论王弼“圣人体无”一观念的哲学意义》（《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1984）虽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却达成了“共商旧学”的任务。

1985年春季，我以富布赖特访问学人的身份，在北京大学的哲学系开设了一门专讲“儒家哲学”的大班课，而且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活动。同时，我也在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第一外语学院（北京）、南开大学（天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深圳大学、山东大学（济南）和曲阜师院等高等学府提出了有关儒家再出发的构想。我从和老（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冯契、石峻）中（如庞朴、汤一介、孙长江、余敦康、李泽厚、陈俊民、金春峰、包遵信、方克立）青（如陈来、甘阳、金观涛、阎步克）三代学人的交往中，体味到法国沙龙、日本会读和宋明时代地方讲学的风味。固然，面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我和大陆学人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就连取径也有迥然异趣之处。但把儒家传统当作严肃的、重要的思想课题，为了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创新，必须对儒学进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梳则是大家的共同认识。有了这种共识，前面所提到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和我的关系多半是师友之间，而且都是我“直、谅、多闻”的益友。

虽然多次前往大陆而且在北京一共居住了17个月之久，但我并没有“旅游”的经验，更没有“作秀”的感觉。固然，我确涉足中华大地的名山大川，也参加过不少为数百人（乃至千人）的讲学集会，但我一般不带相机，不加入游览队伍，

不住观光旅馆，也不接触可以提供特殊条件的单位。我所领会的大陆风光，虽是通过知识人士的有色眼镜，但我也有不少挤公共汽车，在二等舱罚站通宵，买不到水饺充饥，以及和内宾同宿一元人民币一铺的深刻印象。可是，我毕竟是海外学人，有时还享受到连高干也不易奢望的特权。我的大陆经验难免不是散离的、片面的。

1985年腊月，我在湖北的黄州参加了熊十力学术讨论会，接着到上海，参加了由复旦大学主办、在龙柏宾馆举行的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我所提有关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的观点，引起了不少讨论。在沪期间，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学院院长吴侠之邀，和教师及学员进行了一次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座谈。在警卫森严的军事重地，和数百位着戎装的预官谈学术课题，却毫无疏外的感觉是难得的经历。1986年暑假，我参加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的代表团，到曲阜和孔子基金会协商在1987年8月共同举办国际儒学会议的各项事宜。在曲阜期间，我曾禀告徐师复观在天之灵，求允代其履行参谒孔庙的遗志。

在大陆期间最值得回味的，是以“内宾”身份参加学术讨论会。譬如1983年在西安杨虎城故居举行的范畴会议，就是纯属国内学人交流的场合。置身其中，不仅能窥得哲学辩难的真消息，还能亲睹中国哲学史界中坚人物力争学术独立的风骨。我对大陆学坛人物不敢轻易臧否，和这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1985年9月我参加了一个由上海华东师大主办、集中讨论冯契先生《中国古代哲学逻辑发展》一新著的

学术会议。我的室友是包遵信，住在同一套房的还有庞朴、李泽厚、沈善洪、黄万盛和方克立。晚上闲聊，听人民大学的前辈石峻先生以逸事趣闻的风格谈他曾亲炙的学界高人，如熊十力、陈寅恪、马叙伦、刘文典和孟森，真是一饱耳福。《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就是在庐山撰得的。

1987年8月在曲阜的阙里宾馆召开的国际儒学会议，是大陆哲人的群英会。我的发言稿《孟子——士的自觉》，虽然不算什么科研成果，但确是由衷之言，不吐不快。还记得1980年初进谒孟庙的情景（我应属“文革”以来国内外最早前往邹县参拜亚圣的一批）：陆象山的诗句，“墟墓哀衷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一再萦绕耳际。我深信，要想重建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孟子的“深造自得”和“终身之忧”是不可或缺的。《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虽在曲阜起草，但却是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一个小岛度假时写出的。当时邀得的朋友中有汤一介和乐黛云，也有在费城的哈佛大学讲授儒家哲学（特别是《大学》和《中庸》）的德夏堂教授。大家都关切儒家发展的前景问题。话锋一转，便触及世界思潮和儒学动向的关系。不过，这篇文章只“点题”而已，离详为之说还隔着几重公案；若能发挥把议案提到日程上的作用，也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应当说明，这里所收的10篇文字虽然都曾见诸报章杂志，但并不能代表我的定见；它们只不过是我近年的思想痕迹而已。我决定把自己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

题》尚在进行反思的经历公之于世，是想邀请大家同来探索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课题。让我把目前所知这 10 篇文字刊行的情况作一交代，借此对海内外出版界协助我传达心声、广结善缘的机构表示谢忱。《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的节本，曾以《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为题在北京的《读书》（1985 年 10 月）刊出，《新华文摘》转载，全文刊在纽约的《知识分子》（1985 年秋季号）；《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由香港的《九十年代》（1985 年 11 月）一次刊出；《创造的转化》则由已停刊的海外《中报月刊》（1986）分五期连载；《认识传统》和《超越而内在》两篇，发表于新加坡的《亚洲文化》（1987）；《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收在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编的《中国传统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因为是“据发言提纲和录音整理”，所以有“未经作者本人审阅”的申明；由刘刚记录整理的《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没有正式发表，但前面提到的政治学院曾刊印成单行本流传大陆军中；《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由香港的《明报月刊》分三期连载（1986 年 1、2、3 月）；《孟子：士的自觉》和《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两文，则发表于《九州学刊》（1987，1986）。

目 录

自 序 1

壹 北京访谈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3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 29

创造的转化 70

认识传统 133

超越而内在 152

贰 上海论学

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创新 197

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207

叁 庐山反思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249

肆 曲阜回顾

孟子：士（知识分子）的自觉 291

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 295

出版后记 322

壹

北京访谈

薛涌记录、整理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从“轴心时代”看儒家传统

薛涌（以下简称“薛”）：杜维明先生，从 60 年代开始你一直对传统的儒学及其文化价值进行长期的、自觉的反省。我很想了解，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知识分子，你对这一问题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气力，进行这样长时间的思考？有什么动因？古老的儒学，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是否还有它的生命力？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关于儒学的精神及其现代命运，在 60 年代的美国流行着一种说法，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加州大学的列文森。他们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撞击，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最突出的文化遗产越来越没落，儒学的现代命运已经定型了。1905 年科举考试被废除，1911 年专制政体被推翻，1919 年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又遭到了全面的批判。这样，儒学所赖以生长的土壤已经丧失，它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说服力、生命力正迅速减退。在现代中国，想要宣扬儒学的，多半是一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或出于狭隘的国粹主义的旧知识分子。像严复这样的先

进思想家，开始宣扬西化，后来又回到儒学传统上来，只不过是一种保守的倾向，不足以反映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总之，儒家的文化，在 20 世纪初就逐渐被埋葬，到 20 世纪中后期自然更无生命力可言。

这种说法是否能够成立？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它如果成立，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是一个特例。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提出的一个观念。他把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的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一系列思想家；印度出现了优波尼沙（Upanishad）和佛陀；巴勒斯坦拥有一批希伯来的先知；希腊则产生了足以代表其理性精神的一系列伟大天才。总之，在轴心时代最初发动的、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如犹太教文化（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及回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希腊文化等等，不但在 20 世纪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而且放眼 21 世纪，肯定还会继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儒家的文化是否将独自没落下去？从中国文化的发展看，这一源远流长、持续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是否真的将被取而代之？

在列文森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两难：在感情上，他们不能接受所面临的由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事实，常常回到传统、特别是儒学上去；但在理智上，则是完全西化的。他们在与传统决裂时所进行的理智思考，往往言之成理，持

之有故，而他们的生活、行为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他们无法摆脱儒家所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下意识层）所起的作用。因此，他们对儒学所代表的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精神，不可能有继承，更谈不上主动的创造，而对于他们经过理智分析，认为应该引进的西方文化，又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急功好利的态度，对其背后的精神价值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问题是不是这样？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这对我构成了一个挑战。

是否如列文森所说，儒学在中国的影响将消失？或者孔子已被“博物馆化”，和中国现实完全脱离？

我想，问题绝对不会这样简单。

薛：你能否具体地谈一下你对儒学和它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你进行这种理解的角度？

杜：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可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把它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即沉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具有封建色彩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特别是那些在下意识层还起作用的价值和观念。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封建遗毒”。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即代表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种认同、这种文化精神，必须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来掌握和发扬。

认同危机

薛：你所说的“认同”，在文化领域中应该是个比较新的观念吧？

杜：这个观念是 60 年代在美国提出的。所谓“认同”，最早是心理学上的概念。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到某一阶段，会发生一种“认同危机”，就是人的自我定义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应该做什么？这种危机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创伤，也可以使人变得更成熟，更深沉，更有自信。后来，这个概念用得比较广泛：一个社团有社团的认同，一个文化也有文化的认同，甚至一个学科也存在着认同问题。比如社会学家可能就有一种认同危机：到底他们和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有什么区别？这些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独特之处是什么？

从文化的立场看，认同必须经过自觉的奋斗才能实现。文化认同，一定要对传统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同时又是批判的继承和创造。而对于封建意识形态，同样要经过自觉的、群体的、批判的扬弃。现在的情形是，该继承的东西，我们没有继承下来，该扬弃的东西，并没有被扬弃掉。问题恐怕出在我们对传统的复杂性、多层面性缺乏一个自觉的、统一的把握。因此，我自己作了一个决定，从两个角度去把握和理解儒学。一个是历史的角度，一个是哲学的角度。这两方面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哲学谈的是一般规律，历史谈的是具体现象；哲学的思辨，常常突破历史的陈述，历史对具

体现象的把握，又和哲学的思考大不相同。但是，儒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上层一直到广大的民间，它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又是一种生命形态、一种精神方向、一种哲学的人学，它有它内在的逻辑性，有它自己独特的范畴。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把握，也许更符合儒学本身的复杂性。

薛：那么，你认为儒学真正的中心课题是什么？它作为“封建遗毒”这一层面的内容，具体又有什么所指？

杜：我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思想传统，所接触的问题都是比较全面的。同时，任何一个复杂的思想传统，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探索也难免没有其片面性。我们总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通道，才能对基本的哲学问题有所掌握。所以，掌握文化的特殊性是掌握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儒学的兴起，是对于“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传统的没落所作的自觉的、全面的反省。这一反省，同墨家、道家、法家的反省不同，基本上是肯定人类文明、文化的价值，因而对于周代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但是，这不是一般我们所认为的复古，而是对中华民族从殷商以来所构建的文明作了一个内在的肯定，希望这一文明能够延续下去。“兴灭国、继绝世”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感情。因此，在台湾和香港学术界影响极大的徐复观先生提出一种观念，即“忧患意识”，认为这种“忧患意识”的出现，和儒家特殊性格的形成密切相关。